



论韩国朱子学者李退溪关于“情”的性理学思想

(2005-6-29 16:22:18)

作者：李甦平

论述三：

由是观之，二者虽曰皆不外乎理气，而因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与所重而言之，则谓之某为理，某为气，何不可之有乎！

退溪认为，四端与七情，虽然都来自气或理，但因其“所主”、“所重”不同，即指对于理气的所主、所重不同，而形成了四端或七情。这就是“所从来”的意思。可见，“所从来”就是讲四端、七情在形成的根源、途径方面，是以理为主、为重，还是以气为主、为重。关于这个问题，退溪在思想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最初，李退溪将郑之云（1509年—1561年，字静而，号秋恋）的《天命旧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天命新图》中的“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李退溪这样修改后，受到了奇高峰的质疑。于是，他以朱子思想为佐证。如他在答奇明彦第一书中说：

自承示喻，即欲献愚而犹不敢，自以为其所见为必是而无疑，故久而未发。近因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发情是气之发”。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师。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得是说，然后方信愚见不至于大谬。

李退溪认为朱熹所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与自己所说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是一个意思。其实，朱熹这句话在他自己的理论系统中有明确的意涵，而其中两个“发”字的涵义也不相同：“理之发”的“发”，意谓“理是四端的存有依据”；“气之发”的“发”，则指心理学意义的“引发”，谓七情是由气之活动所引发。在朱熹的理论系统中，“理”本身不活动，因此不能说四端是由理之活动所引发。所以，这里的理之“发”为虚说，而气之“发”为实说。

这之后，李退溪又经过深思熟虑，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

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

他在《答李宏仲问目》中也说：

天下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理而无气之随，则作出来不成；气而无理之乘，则陷利欲而为禽兽。

晚年，他在《圣学十图》等六图《心统性情图》中还是说：

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

上述三段论述集中反映了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形成根源和途径及善恶性质的完整思想。我们可以分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译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论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掩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文字上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到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乖”，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乖”，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退溪通过“发”、“随”、“乖”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主张人性之善。主张性善说乃是孟子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

李退溪在阐述“四端”与“七情”的区别时，还形象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 人马喻。

古人以人乘马出入，比理乘气而行正好。盖人非马不出入，马非人失轨途，人马相须不相离。人有指说此者，或泛指而言其行，则人马皆在其中，四、七浑沦而言者是也。或指言人行，则不须并言马，而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马行，则不须并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

以人马喻四端和七情，是退溪在回答奇明彦时做的一个比喻。文中的人马喻出自朱熹。朱熹认为，理乘气而行，犹如“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退溪用朱熹这一比喻来说明四端与七情的关系。他说：人不乘马不能行走，而马无人驾驭就会迷失方向，人与马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的。这就如同浑沦而言四端与七情的关系，它们相须不分。而仅指人行而言时，则不必提到马，虽然马也在其中，但这是专指四端。而仅指马行而言时，则不必提到人，虽然人也在其中，但这是专指七情。可见，退溪这一比喻的主旨，还是在强调或以人行（四端）为主，或以马行（七情）为重。以此突出四端与七情的不同性质和不同来源。

例二， 月亮喻。

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说，尝见先儒有论其不可。今不记得。但就来喻而论之，天上水中虽同是一月，然天上真形而水中特光影耳。故天上指月则实得，而水中捞月则无得也。……盖月之在水，水静则月亦静，水动则月亦动。其于动也，安流清漾，光景映彻者，水月之动固无碍也。其或水就下而奔流，及为风簸而荡，石激而跃，则月为之破碎闪颺，凌乱灭没而甚，则遂至于无月矣。夫如是，岂可日水中之月有明有暗，皆月之所为而非水之所得与乎？滉故曰：月之光景，呈露于安流清漾者，虽指月言其动，而水动在其中矣。若水因风簸石激而日月无月者，只当指水而言其动，而其月之有无明暗，系水动之大小如何耳。

这一比喻是在回答奇明彦时讲的。文中“月落万川”，是朱熹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之说，来说明他的“理一分殊”的道理。而退溪的月亮喻则与朱熹的月亮喻的侧重点不同。他强调天上的月亮是真、是实；而水中的月亮是虚、是无。另外，退溪还强调水中月亮的形成原因不仅仅是天上月亮之影，它还受到水的多方面影响。如当水流奔腾急下，加以风吹波浪，石激浪花，那么月影则破碎不堪，乃至完全灭没，就没有水中之月了。所以，天上之月和水中之月是性质不同的月亮。这就表明了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是为了凸显“四端”为理发，为纯善，其目的在于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找道德根源，以此说明“善”本来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努力，就可以认识到人的本质，恢复人的本来面貌，从而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之中做一个真实的人。退溪的这一思想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仍然是价值的，这也是退溪“情”论思想赋予我们的时代课题。

